

第3辑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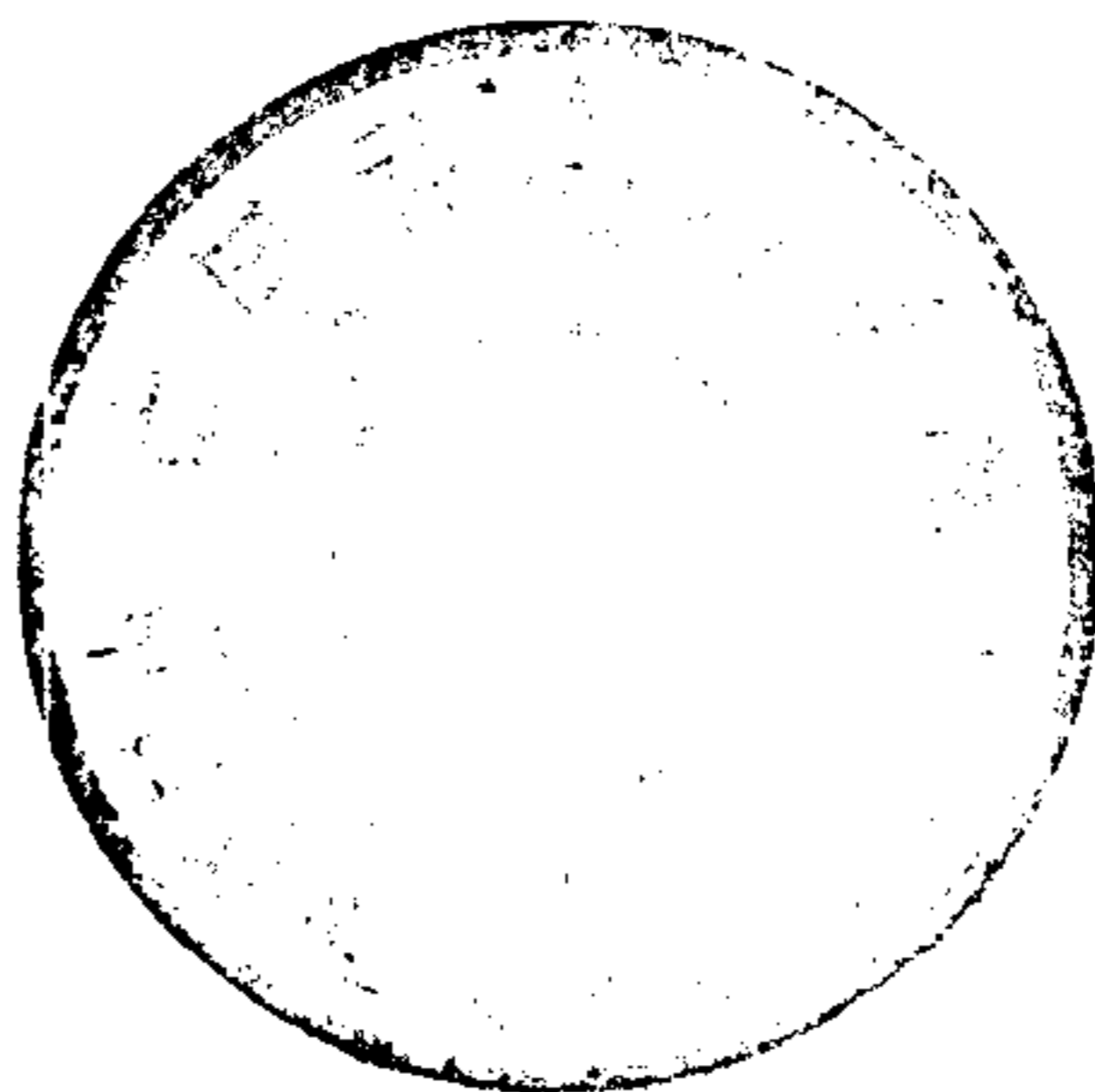
7

K25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172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三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312千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800册

统一书号：11190·092 定价：1.40元

目 录

-
- 1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 … B·罗米纳兹
邹宁 译
- 32 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 …… П·米夫
邹宁 译
- 53 中共“五大”与大革命的教训 …… B·格鲁宁
丁如筠 译 林荫成 校
- 70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摘记 …… K·舍维廖夫
曾宪权 译 林荫成 校
- 87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森时彦
宋绍柏 译 傅中午 校
- 123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校史摘记 …… Г·叶菲莫夫
丁如筠 译 林荫成 校
- 132 第一次和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 栗原健
章伯锋 译 邹念之 校
- 148 孙中山与“满蒙”问题 …… 藤井昇三
朴成昊 丁贤俊 译
- 165 麦克马洪线(1911—1945)：英国的遗产 …… K·古普塔
金宗英 译
- 196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美关系
——战后日美关系的前提之一 …… 山极晃
宫毅 译

- 238 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
——北洋派的企业活动…………… 渡边惇
邹念之 译
- 297 奉票的盛衰 (1917—1928):
中国军阀时代的货币改革…………… R·苏莱斯基
沈祖诒 译 李臻 吕浦 校
- 313 中国早期发展经历中的西方技术人员
和技术援助: 福州船政局 (1866—
1875)…………… 庞百腾
韩荣芳 译 赵燕南 校
- 328 列·托尔斯泰论历史过程的规律以及
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B·基雅可夫
吴永清 译 林荫成 校
- 352 近年日本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山田辰雄
黄光域 译 吕浦 校
- 377 有关孙中山的几件资料……………李辉 译
孙中山的一次未被注意的谈话 (评论)…………… K·舍维廖夫
孙中山的一次谈话
孙中山与“广州新闻社”记者的谈话 (1924年3月)
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 (1924年9月12日)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 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

——B. 罗米纳兹

编者按：罗米纳兹的这篇文章和后面米夫的文章《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战略问题的争论的一个片断。这一争论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在1927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罗米纳兹提出：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封建主义，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构不成一个有实力的政治力量；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工农革命，这种革命会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为实现这一革命任务，共产国际在中国应采取立即组织暴动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米夫和布哈林都不同意罗米纳兹的意见，在会上展开了争论。这次大会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8年2月召开第九次全会。罗米纳兹和米夫的这两篇文章，即是在全会召开之前发表的。罗米纳兹在文章中继续坚持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观点，米夫则继续对他的观点进行分析批判。第九次全会否决了罗米纳兹的意见，认为他的错误与1905年托洛茨基的错误相似。

一

显然，在日内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工作中，中国问题即使不占据中心地位，也必定是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之后的九个月期间，中

国国内外的局势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中国革命出现了如此急转直下的突变，以致各个阶级的作用和它们的组合都发生了变化，因而最后，迅猛涌现出来的事变揭示出革命过程的一些特点和新形式，使得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现在**竟具有十分**新颖**的内容和意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能只限于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局部的“暂时性”问题作出决定；它必须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和第八次全会讨论过的那些问题，全都**重新**提出来。问题并不在于撤销或“修正”（这个词的一般通用的含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和决定，因为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已经证实了它们的正确性。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以革命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着，因而昨天完全正确的东西，今天竟然是有所不足的了。共产国际基本上正确地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一般任务、性质和发展趋势。然而，即使这些**一般的决定**，今天也应当有所改变，因为中国在1927年四月和七月事变之后所进入的**新的历史时期**，展示出丰富的新内容、意外的独特斗争形式和斗争力量的对比。革命的实践丰富着革命理论，并推动着革命理论向前发展。目前，若是对中国问题仍抓住陈旧的一般公式不放，即使这些公式**曾经**一时是正确的，那也意味着把革命理论从行动的指南变成死板的教条。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不只是策略上的问题，而且一般的问题（例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都会**重新地、不同于以往地**提出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需要极其重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决定着中国共产党长时期的整个**战略方针**。单单这一项任务本身就已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何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还面临着许许多多“暂时性”问题，这些问题使这项任务更加复杂了。目前，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呢？革命形势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还是革命的发展出现了停滞？那些几乎每天都从中国来电中获悉的消息——罢工和起义，是那些分散和撤退的革命阶级的后卫战吗？它们是开始出现革命斗争新高潮的信号吗？特别是，广州十二月起义究竟是怎么

回事：它是“革命低潮中盲动的范例”，还是日益发展的群众革命运动在反动阵营中打开的一个大缺口？中国地主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巩固和加强了吗？如果没有，那末，为什么在几乎整整一年里，革命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惨重呢？这些问题使全世界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群众焦急不安，期待着共产国际现在给予解答。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和事变的整个进程，将有极其重大的直接的实际意义。这个解答将决定中国共产党最近整个时期的策略。而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虽然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虽然它的队伍在白色恐怖的打击下大大削弱了，但它在中国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却起着巨大的、独有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劳动群众唯一的革命政党，而且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力量。中国整个革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力量的行动方向。这已为过去的全部经验所完全证实。1927年4—7月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危急时期，公开抗拒共产国际的路线和要求，实行了极端机会主义的、半孟什维主义的策略，因而束缚了群众的革命主动精神，使群众的队伍混乱起来。中国共产党八月会议以后，纠正了这个时期的错误，撤换了党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蓄意偏离共产国际给它规定的路线的危险，可以认为是消除了。现在，整个问题就在于，**这条策略路线将是怎样的路线**。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必须通过一些至关重要的决议，以便最直接地声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斗争的结局。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工作中，中国问题将占据最主要的地位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地位。

每当共产国际面临目前中国问题这样复杂而又困难的任务时，通常总是要通过各种见解、观点和实际提案的冲突与斗争，任务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之前为中国问题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对于许多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原则问

题，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中间显露出意见分歧。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展开的争论，毫无疑问会引起我们党的广大党员群众很大的兴趣。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向《布尔什维克》的读者介绍那些应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上解决的主要争论问题。然而，这篇文章并不企图淡漠地、不偏不倚地阐述有关中国问题的争论中出现的各种观点；本文将尽可能地不以论战的方式、而以实证的方式来阐明和维护有关中国问题的一条明确的路线。

二

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最确切地客观上查明每个历史关键时刻的阶级对比和具体特征。我们布尔什维克要按照一切科学的政治论据，永远力求忠于这个绝对必须照办的要求。”理解一切历史时期的性质的关键，首先就是阶级的对比关系。因此，应当依据这个准则来研究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民族资产阶级已从革命阵营完全、彻底地转到地主军阀反动派和外国资本的阵营中去。但是，从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却往往是非常错误的，而且经常是不完备、不确切的。我们来列举几个错误结论的例子。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米夫同志同我争论的时候，说过下面一段话：

“不能从政治舞台上撤除（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恰恰是（！）资产阶级还能通过民族主义途径把广大的流氓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群众，以及关系重大的中国农民阶层带领起来。争取这些群众，争取这些还处于资产阶级分子影响之下的农民阶层——这个斗争向共产党人提出的任务是：要忘我地进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尽力促使那些在社会上同无产阶级关系密切的力量摆脱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把广大群

众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

再也没有比米夫同志的这些论点更谬误的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坚决、彻底地向外国资本投降了。它恬不知耻地叛卖了民族革命的旗帜。它完全公开地与帝国主义者达成“交易”，以便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而且，在这种“交易”中，帝国主义者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并不是平等的交易双方，而是有绝对权力的主人和阿谀奉承的奴仆。这样说，并没有任何过份的地方。中国资产阶级在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上，起着卑贱的奴才作用。中国南方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直接依据帝国主义者的命令，同苏联断交了，这使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利益遭受了损失。中国南方与苏联断交，会大大削弱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的地位，这个行动仅只有利于外国资本，对于这一点，未必会有人怀疑。①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早已消失无遗了。总之，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明显地表现出公然的反民族的性质。要想证实这种情况，可以列举出无数的例子和事实。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引证公认的民族资产阶级领袖和代表人物的两个官方声明。请看蒋介石12月13日对外国记者所作的声明。

“我现在的信念是：我们不应当仅限于同苏联断交，而且还应当同其余大国联合起来，以便同共产党作斗争。”

请看那个直到最近还企图以坚信孙中山遗教的“左派”、激进“国民党人”自居的汪精卫，由于刻骨地仇视工农运动，而在12月1日说了些什么。②

① 前几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报道：在汉口，“根据中国当局的命令”，封闭了苏联商务代办处分处，驱逐了它的工作人员。同中国广泛进行贸易活动的苏联商务代办处，是在中国同苏联断交之后，根据中国商人的要求，在整个华南地区保留下来的。如果它们现在被封闭了，那是由于军阀当局骇人听闻的横行霸道和英国资本的强求而造成的，因为英国资本在资产阶级和地主反动统治时期随心所欲地主宰一切。

② 这个令人厌恶的丑角的“左派”词句，使得某些共产党员（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我们这里，在苏联）迷惑起来，继续认为汪精卫是激进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国民党内一个应受“十分重视”的“独特派别”的代表。

“我们依然坚持以往的观点，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不过，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今后将不会再像我党处于共产党人影响之下时那样的强硬了。以往的对外政策，在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影响之下，明显地表现出排斥外国的特征。现在，和共产党人决裂以后，我们将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我们的行动取决于各个大国的行动。今后，我们将不再使用以往的那些排斥外国的口号，斗争方式也将有所改变。”

详尽地论述这两个声明，是没有必要的。既然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们说出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什么别的，而只能叫作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卑鄙的背叛。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实行殖民瓜分的计划，不仅不会遭到中国资产阶级任何严正的抗拒，而且还会直接由中国资产阶级经手来实现；假若其他力量和其他情况（这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没有阻碍计划实施的话，那这个计划早已实现了。米夫同志无可挽回地搞乱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中国资产阶级早已成了反民族的因素，它的政策是直接叛卖民族运动的利益，而民族运动本身却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因为它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农民。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就必然要带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

米夫同志认为存在着危机，说什么中国资产阶级还能通过“民族主义途径”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城市贫民群众（！！）等等带领起来，他究竟有什么根据呢？也许米夫同志以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在或将要进行广泛的民族主义宣传，以便欺骗劳动群众。可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声明，以及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舆论的全部宣传活动，完全推翻了这种推断。即使资产阶级想要利用民族主义宣传来争取群众的信任，那它也不能稍微广泛地开展这种宣传了，因为，第一、它担心别把自己的帝国

主义保护者惹火了，而第二、这种宣传不可避免地会整个扭过头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仅就抵制洋货这个政治运动来看（它开展得并不经常，而且软弱无力），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久以前，当“左派”人士汪精卫和张发奎企图在广州开展抵制洋货的运动时，他们立即叫广州商业局“安分一些”，因为商业局曾对这个运动提出异议，其借口是“日本已从上海撤走自己的军队，因而抵制日货就毫无意义了”。米夫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竟如此歪曲中国的真实情况，以致难于找到对这种歪曲的任何解释。也许，米夫同志需要这种歪曲，以便得出十分虚假的政治结论，并据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斗争中（米夫同志甚至强调说——在忘我的斗争中）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要知道，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不可原谅的错误！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充满了以往历史时期的全部内容，而这个时期在1927年4—7月已经结束了。这个斗争以资产阶级完全转到反革命方面而告终，从而也就解决了应由哪个阶级领导革命运动的问题。1927年7月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在各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联盟中是唯一的领袖和领导者。今天的问题不是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历史上解决了，而且是彻底地解决了！），而是扩大、加强和在组织上巩固无产阶级在整个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因为革命运动在自发地、极不平衡地发展着。

当资产阶级还参加革命运动，而且竭力保证自己在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时候，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这是中国革命过去的、业已消失的阶段中的情况。在新的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领导权。谁若是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一窍不通。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论米夫同志的错误，看来是易于理解的，因为这些错误并不是偶然的，而且这不只是米夫同志一个人的毛病。我们在罗佐夫斯基同志这样出名的政治活动家那里，也能看

到这种错误，不过它表现得多少有点隐蔽罢了。1927年10月4日，罗佐夫斯基同志向哈尔科夫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①中有下面一段话：

“最近几年，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除了买办资产阶级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成长起来了，我在中国曾经听到这样一整套论断，说什么中国没有大资产阶级，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都是一些外国人，中国的资产阶级必定是小资产阶级。这种论断无疑是不正确的，它不符合实际情况。在中国，有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业的、工业的、金融的。你们可以在上海看到上百家中国的民族银行，当然它们没有汇丰银行那么大；一些规模很大的商号、工厂、掌握在中国资本家手里。从上海起，沿着长江两岸，在各大工业所在地，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使用大量工人的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力求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以便由它自己去剥削工人阶级。它希望中国能取得独立，能关税自主，能有稳定的货币制度；它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还希望能摆脱掠夺性的军事制度。它极力想把中国从外国大炮威胁下解救出来，以便把国家变成它自己的资本主义天堂……它可以起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现在，因为以民族资产阶级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已经控制了全中国。”

我们所以要从罗佐夫斯基同志的讲话中引用如此冗长的一段话，就是因为这段话好像是综合了我们通常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时所发生的一切错误。因此，我们至少也要谈谈这些错误中的一些最主要的部分。

我们不知道罗佐夫斯基同志在中国从谁那里听到否定中国有大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苏联，相当普遍流传的一种“论断”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在大规模的商业中，以及在金融和银行事业方面，一切经济命脉都是由外国资本来掌握。在中国，没有任何一

^① 这个报告转载于1928年出版的《论中国》文集中，我们从那里摘取了这段话。

个稍微重要的工业部门（丝织业除外），外国资本不在那里占据统治的地位。甚至在纺织工业中，根据日本报纸1927年12月份显然已经缩小了的数字（因为其中没有计入外国人对那些形式上属于中国人的企业的投资），外国资本也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四。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外国资本在纺织品生产中所占的份额。通常，中国企业的机器装备是比较昂贵的，而开工率却大大低于外国工厂。在最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烟草工业中，外国资本所占的比重更大。大资本主义类型的面粉厂和榨油厂，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属于外国资本。在其他一切工业部门中，尤其是在采矿和冶金部门，中国民族资本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海运和河运业也几乎完全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而铁路运输业，外国资本至少也占有百分之八十。至于金融和银行事业，仅英国汇丰银行一家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就比中国所有的民族银行加在一起所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这家银行专门经营食盐专卖和关税的收入；它控制白银（中国的基本货币本位）的价格和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它左右着中国金融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几百个中国的银行机构和工商业机构的生存。罗佐夫斯基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威力入了迷，而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对于上海的中国的银行，他认为需要指出的仅仅是：“当然它们没有汇丰银行那么大”！其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而是一个到过中国的旅游者在上海街头看见许许多多中国的银行招牌而得出的极其肤浅的印象。而罗佐夫斯基同志所谈的中国民族工业的情况，即使对于最轻率的旅游者来说，也是看不到的，因为任何一个顺着长江旅行的人，决不能在荒无人迹的两岸上“看到”岸上所没有的东西。整个长江流域，只有在上海（恰巧它位于长江的支流上）和汉口^①可以“看到”大的资本主义工业，而这些工业大部分属于外国资本。毫无疑问，罗佐夫斯基同志在描述自己对中国的观感上太入迷了，也显得太过分了。

^① 如果南京的几个轧棉厂和1922年关闭的湖北省太平工厂不计在内。

当然，中国有大民族资产阶级。不过，不能把它和美国、英国或德国的资产阶级相提并论，并且要依据这一点（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受外国资本的压制）对它的社会经济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据说，罗佐夫斯基同志恰恰也是这样做的。例如，罗佐夫斯基同志在谈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问题时，为了证实中国有金融资本，就曾援引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上百个上海的银行。不过，把中国的银行资本与**现代金融资本**（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相提并论，就等于把现代银行家与高利贷者相提并论。而“在银行家和高利贷者之间，有两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别和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的差别。”（马克思语）

中国的银行资本只不过是**高利贷资本**的一种形式，是它的一个变种。谁都知道，高利贷资本是在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关系占优势的地方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我们不能在本文中稍微详尽地谈论高利贷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问题。^①我们只指出一些基本因素，因为它们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有直接关系。第一、中国高利贷资本与外国资本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为外国资本行使**买办的职能**。中国的银行大都是帝国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买办代理机构**。外国资本与中国高利盘剥的联系，决不意味着高利贷资本变成了现代的金融资本。相反的结论倒是比较正确的：外国金融资本在中国往往行使高利贷资本的职能。^②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其原因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力求保留中国资本主义前的生产关系，而这并不妨碍它违反自己的意愿去破坏这种生产关系。

第二、在中国，无论在农业中，还是在整个工商业中，高利贷资本都占据主导的、支配的地位。中国民族工业自然要按高利贷利息的条件，从中国的银行取得**流动资本**。在中国的情况下，

^① 这个问题，在马基亚尔同志阐述中国经济问题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了极其详尽的探讨。这部卓越的著作很快就将出版了。我们也从这部著作中借用了一些关于高利贷资本的结论。

^② 外国资本在中国大都行使商业资本的职能。

极高的利率使借贷的资本具有高利贷资本的性质。根据这种情况就可以想到，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多么不发达。谁都知道，“国内利率的高低，对于工业发展的水平，乃是相反的关系”（马克思语）。此外，还应补充一点：甚至中国的大企业，也是依据高利贷资本所固有的原则来经营，而不是依据资本主义核算的原则来经营。我们不算更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只是要指出，这种情况乃是中国企业主经常更换的原因之一。一般说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迟，在中国尚未来得及形成稍微固定的企业主阶级。因此，几乎每个中国资本家都与地主土地占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资产阶级还未曾切断它与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前的、半封建的血缘关系。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象，完全不是罗佐夫斯基同志所描绘的那种欧洲的类型。它是中国社会中最不成熟的、落后的阶级，它还没有度过中国旧社会的婴儿时期。革命的爆发，正值中国资产阶级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它还没来得及定型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立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反对外国资本的压迫，消灭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中那些资本主义前的半封建关系的残余，即排除那些阻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也阻挠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以革命方式解决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任务——这条道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乃是它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独立阶级进行社会和政治自决的一条唯一的道路。不过，历史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处于两面夹攻的地位。民族革命产生了这样一些力量，它们不仅能摧毁旧制度和消灭反动阶级及外国资本的统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发生极其尖锐的冲突。由于有了年青的中国无产阶级（它不只是民族工商业、而且首先是外国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民族资产阶级就遇到了自己的最可怕的死敌。随着提出共产主义口号和阶级要求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或则在革命中丧失一切，或则向反动势力和外国资本投降，借以至少

保住自己的现状。资产阶级**迫不得已**，向那个它最先起来反对的旧制度投降了。

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地主军阀反动势力和外国资本的阵营中去，从它自己这方面来说，并不是相机行事（因为相机行事在有一定的选择自由的地方才能采用），而是向旧制度**完全不可避免的投降**。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在革命尚未解决任何一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任务之前就投降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投降**，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上的最大的破产**，注定了它在社会政治上的退化和腐朽。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摧毁了1927年4—7月的工农群众运动，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也是一次历史性的失败，因为这截断了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一切道路，对于这个情况，罗佐夫斯基同志也是不理解的。他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求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希望中国能取得独立，……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还希望能摆脱掠夺性的军事制度”等等——这种论断，是庸俗而又肤浅的。何必要管谁希望什么呢！在社会斗争中，起作用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这个或那个阶级不得不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官僚等等的政策，是**完全投降的政策**。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罗佐夫斯基同志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动阵营里起着**首要的、领导的作用**——他所作的这个结论，也是完全错误的。恰恰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在外国资本和地主、军阀反动势力的同盟中，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占**从属的地位**。它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所起的作用，无论是在反动阵营里，还是在中国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在日益减小。只是在一个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在不断地增长：它在疯狂憎恨被压迫阶级的运动上，在血腥镇压运动的方式上，在企图收买、腐蚀、瓦解工人阶级的干部上，在恬不知耻地把革命口号和孙中山学说用于卑劣的目的上，胜过了它的反动阵营中的一切同盟者。不过，这是历史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创造性”活动而提供的唯一的